

分类号\_\_\_\_\_

密 级\_\_\_\_\_

U D C \_\_\_\_\_

编 号 1 0 5 2 0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 德国海德堡大学中国新闻史研究成 果评析

——以《只是空言：晚清中国的政治话语和上海报刊》  
为例

研 究 生 姓 名：欧 阳 伊 岚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刘 兰 珍 副 教 授

学 科 门 类：文 学

专 业 名 称：新 闻 学

研 究 方 向：新 闻 史

入 学 时 间：二〇一四年九月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日

# **Analyse of the Heidelberg University's History Study of Chinese Journalism**

*illustrated by the example of 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r 19. Jahrhunderts*

2017. 5. 20

##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的作品。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标明。

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 欧阳伊岚

2017年5月20日

##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书

本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管理办法及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学校有关数据库和收录到《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信息服务,也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或汇编本学位论文。

在本文获评校级以上(含校级)优秀论文的前提下,授权学校研究生院与中国知网签订收录协议并由作者本人享有、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注:保密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于本授权书。

作者签名: 欧阳伊岚

2017年5月20日

## 摘要

对于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是海外汉学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研究独树一帜，他们成立的“中国公共领域的结构与发展”小组借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观测中国情况，以晚清时期报刊作为切入点，从全球化视角来考察和分析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地位、转型和困境，但这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却鲜为国内熟知。

本文以燕安黛著作《只是空言：晚清中国的政治话语和上海报刊》为切入点，以文本解读方法，具体分析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中国公共领域的结构与发展”研究小组的中国新闻史系列研究成果，评析其近现代中国报刊研究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通过梳理海德堡大学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能够为中国的新闻史研究领域提供新的信息与资料，新的视角和新的参照系统，有助于丰富国内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模式，同时有利于推动我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成果走向世界。

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并对本文所研究的问题进行相关领域的文献研究；第二部分阐述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渊源；第三部分主要以燕安黛《只是空言》为例，剖析其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第四部分着重分析《只是空言》一书的主要观点：燕安黛在本书中提出晚清时期报刊介入中国公共领域的三个层次，详细分析了燕安黛对报纸、报社员工和其文学产品三个层面的观点；第五部分评析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中国新闻史的系列研究成果，对比分析优势和劣势；第六部分为总结，再次重申该系列研究新观点、优势及不足，并观测其研究方法、思路对中国自身新闻史研究的参照意义，此外阐述了本文作者的创造性工作及研究成果的意义，并进一步提出需要讨论的问题和建议。

**关键词：**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中国新闻史研究；公共领域理论；燕安黛；《只是空言》；晚清报刊

## Abstract

The study of Chinese journalis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sinology. Among them, the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Germany Department of Sinology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is unique, they set up the "Chinese public domain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group borrow Habermas's "public domain theory" to observe China, the late Qing Dynasty newspapers Point of 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to examine and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s communication, status, transformation and predicament, but this series of influential research results are rarely known for domestic.

Through translation the of the work *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through the text interpretation method, analysis one of the main research results of "China's public domain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Nur leere Reden*, analyse its modern Chinese newspaper research theoretical framework,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conclusions. By comb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Heidelberg University Research Group, we can provide new information, new perspectives and new reference system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journalism history, and help to enrich the domestic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history of China's journalism research results to the world.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six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introduction, elaborate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the research purpose and the significance, the research method as well as the innovation place, and carries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to the related research question in this article etc; The second part elaborates the Heidelberg University sinology department Chinese news history research The third part mainly take Anderea Janku's *Nur leere Reden*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how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methods work; the third part relates to the main points of the literary work, in the Anderea Janku'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hree levels of the newspape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is involved in the three levels of the Chinese public domain. The fourth part analyze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at Heidelberg University. The fifth part as a summary, once again reiterated its new ideas, advantages and shortcomings, and observe its research methods, ideas on China's own journalism research reference significance, in addition to the author's creativity Work and research results, and to further raise the issues and recommendations that need to be discussed.

**Key words:** Chinese journalism history    public domain    Heidelber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inology    Late Qing Dynast

# 目录

绪论.....	1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1
二、文献综述 .....	1
三、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3
四、本文创新点 .....	4
第一章 海德堡大学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渊源 .....	6
第一节 研究者与时代背景分析 .....	6
一、海德堡大学及其治学传统 .....	6
二、“中国公共领域的结构与发展”小组及其研究成果 .....	7
三、燕安黛博士及其研究成果 .....	7
第二节 海德堡大学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理论渊源 .....	8
一、哈贝马斯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	9
二、海德堡大学系列研究与公共领域理论 .....	9
第二章 《只是空言》研究结构及研究方法分析 .....	11
第一节 《只是空言》研究结构分析 .....	11
第二节 《只是空言》研究方法分析 .....	12
一、文本分析法 .....	12
二、比较研究法 .....	14
第三章 《只是空言》新闻思想研究 .....	16
第一节 从“空言”到“舆论”——报纸作为公共意见载体参与政治进程 ..	16
一、于下，信息达民从而形成对既定机构的替代 .....	16
二、于上，报刊担当“新国民”监督政府 .....	17
三、国与民之间，报刊构建沟通平台 .....	18
第二节 从“论说”到“社论”——公共政治话语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	21
一、论说建立 .....	21
二、论说模型分析 .....	23
三、从论说到社论：政治社评的现代表现形式 .....	25
第三节 从“文人”到“记者”——晚清报人政治意识的觉醒 .....	25

一、文人记者形象重构 .....	26
二、文人记者精神剖析 .....	27
<b>第四章 评析海德堡大学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特点及不足 .....</b>	<b>29</b>
第一节 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系列研究特点及启示 .....	29
一、一手材料详实完善 .....	29
二、问题意识主导新闻史研究 .....	31
三、不局限于通论 .....	31
第二节 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系列研究不足及反思 .....	34
一、意识形态的影响 .....	34
二、全面性不足 .....	35
<b>结语.....</b>	<b>37</b>
<b>参考文献.....</b>	<b>40</b>
<b>致谢.....</b>	<b>44</b>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西方学者对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是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中既有在其本土的研究者，也有在中国从事新闻学教学和新闻业务工作的人，他们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而其中德国学者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在西方更是独树一帜，尤其是对于晚清和民国新闻事业的研究更是成果卓著，体现出专而精的特质。

1962 年，海德堡大学创建汉学系，为东方与古代文化学院下属的一个机构，首任教授兼所长为鲍吾刚博士，1987 年，瓦格纳成为第三任所长。自瓦格纳继任后，海德堡汉学研究所逐步显示出两个强项，一是图书馆建设，二是汉语教学。在任期间，瓦格纳主持了一个名为“中国公共领域的结构与发展”的研究小组，深入研究关于中国新闻发展史与近代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成果斐然。但是，到目前为止，对德国这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的关注少之又少，更谈不上系统和深入。通过知网搜索，发现目前仅有复旦大学周婷婷等发表的对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早期中文报刊研究概况的介绍性论文。

研究小组最主要、系统的三个项目分别是梅嘉乐的教授资格论文，和燕安黛、费南山两人的博士论文，目前都已成书出版，梅嘉乐的书是英文版，燕、费两人的是德文版。德国海德堡大学“中国公共领域的结构与发展”小组将晚清时期报刊作为切入点，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考察和分析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地位和困境，分析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新闻事业带来的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从经济、政治、社会情境的多维视角来解读中国新闻传播事业。

通过梳理、译介小组主要项目之一——燕安黛（Andrea Janku）的《只是空言：晚清中国的政治话语和上海报刊》以及组员资料文献，通过文本阅读分析对比其研究特点，了解德国学者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对于进一步提升我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科学水平有所帮助；另一方面，研究西方文化视野下德国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方法成果，对于中国新闻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开拓性意义。



## 二、文献综述

“新闻史研究著作成果”包括新闻史研究著作、新闻业历史资料及含有介绍或研究“新闻史”内容章节的图书。<sup>1</sup>国内研究情况可分为两个部分进行考察，其一是国内学者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其二是国内学者对西方学者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的研究。

国内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早在19世纪晚期就开始出现了有关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但系统地来说，1908年，章士钊出版的《苏报案纪事》是我国最早的报纸个案史著作<sup>2</sup>，1908年到1949年建国，可以被视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萌芽阶段。在该时期中，戈公振1927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被视为史学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它代表的是上个世纪上半叶我国新闻史的最高研究水平。

1949—1978年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研究规模相较前一时期有较大提升，专著、论文数量和水平大大高于建国之前的研究，该时期研究的“重点主要是五四运动和中共建党以来，由中共主办的和在中共领导或影响下创办起来的各类报刊的历史。”<sup>3</sup>在受到全面学习苏联思想的影响下，该时期研究较为单一。

1978年后，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下，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也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时期。总的来说，截止到目前，我国新闻史的研究成果集中在“通史”的研究、“断代史”的研究、地方新闻史研究、各类专史的研究、重点报纸的历史研究、广播电视史研究、新闻史人物研究。可以说，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新闻史研究在不断发展和探索更新中，成果斐然。但国内目前的新闻史研究基本上采用传统研究方法，即以史料为依据，作逻辑上、理论上的综合分析。

另一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持续升温，并产生了有关中国现代传媒发展的系列研究成果，对于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也是海外汉学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来华办报的传教士开启了外国人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先河。1895年世界报业公会的成立真正形成了西方各国人互动与对话的场所，全球范围内的新闻史研究相继展开。根据罗文达的统计，截止1937年，关于中国报业研究的西文文献就已达681种，包括英、法、俄、德、西班牙、意大利文等著述。<sup>4</sup>

1 认定依据主要是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编，记录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及国内其他主要图书馆所收藏的民国时期出版(印行)图书的《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化科学》分册所著录的有关图书内容提要，参考周伟明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学图书精介》(复旦大学出版2008年版)和徐培汀所著《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史学史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的有关内容，确认其“新闻史研究成果”的性质。

2 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一)》，《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1期。

3 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1期。

4 罗文达：《关于中国报学西文文字索引》，《社会经济季刊》1937年第9卷第4号。

李金铨教授认为,“海外中国传媒研究的第一代学人的研究以介绍中国情况为主”<sup>5</sup>,第二代则转而对中共苏联以及中共中国的大众劝服、政治宣传产生兴趣。

作为海外中国史研究领域大军中的一员,德国学者对我国新闻史研究的成果丰富,他们在西方学术界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学者罗文达在燕京大学任教并对中国公共传播事业开始独立研究,其著作《中国宗教报刊》是迄今为止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宗教报刊最为全面和深入的一本学术著作。罗文达的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研究,主要是专题性的实际调查,以对中国新闻业的经济和技术调查为主,以丰富而确凿的第一手数据分析见长。

上世纪60年代,沃尔夫冈·莫尔(毛富刚)已在慕尼黑大学讲授中国近现代报刊课程,并出版了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报刊》,后来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历史的德国学者,皆援引他的史料。

对于这一系列海外新闻史研究成果,国内学者通过翻译或译述的方式,向中国学者介绍西方学者如何研究中国新闻史,如王富贵翻译的《中国报纸1800-1912》、林语堂的《中国新闻舆论史》、赵敏恒的《外人在华新闻事业》等著作均可在国内图书市场找到。这是研究中国报刊文化起源和发展必不可少却又屡被忽略的重要史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新开端,新窗口。

### 三、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笔者通过文献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方法,具体分析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以燕安黛为代表的汉学家以及“中国公共领域的结构与发展”研究小组其他成员的主要研究成果,探索海德堡汉学系近现代中国报刊研究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

笔者首先通过梳理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总体历史进程与重要成果,对主要汉学家及研究小组主要成员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概括,为本研究确定准确的逻辑起点。在大量搜集原始文献,并将其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对其研究视野、内容、方法和特点进行总结,以期为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and 新的参照系统。

笔者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如下:

文献分析法:广泛搜集呈现德国海德堡大学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的学术期刊、报纸文献、专著,并对其进行整理。在阅读现有期刊的过程中搜集更多的原始资料,对

---

5 李金铨,刘兢:《海外中国传媒研究的知识地图》,《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

其进行甄别、选择、整理，编制出论文写作过程中最为需要的文献清单。

文本分析法：在文献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对已有文献进行全面地文本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透过原始资料全面地了解提纲中提到的学者对中国新闻史研究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研究特点，对其进行进一步地综合分析，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和基本观点，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为新闻史研究提供更新的特点。

#### 四、本文创新点

综上所述，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以下几点：

##### （一）选题新

上文已经提到，德国学者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独树一帜，特别是对于晚清和民国新闻事业的研究更是成果卓著，然而国内对于这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关注甚少，只有一篇论文涉及。

经过笔者在文献期刊网站上的检索，所呈现关于“中国新闻史”的学术研究论文和学术专著内容繁多，数量均以万计算。然而结合“德国”、“海德堡”、“研究特点”等关键词进一步搜索，发现数量极其有限。相对于国内对中国新闻史形成的系统研究成果，无论是国外对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的原始资料，还是国内学者对西方学者中国新闻史研究特点的研究，在整个关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系中均显得很薄弱，因此本文选题十分新颖。

##### （二）视野新

参照德国学者的研究，反观我国自身新闻史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是将中国新闻史的研究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之中，即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进程置于全球化的格局之下进行反思和展望，是对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视野一个崭新的拓展。

##### （三）材料新

一半以上文献需要阅读外文原著，所引用的资料 and 观点几乎没有重复呈现，有些研究材料虽然十分重要，但在国内堪称冷门，这对于引入新观点具有重大意义。综观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对早期中文报刊的研究，发现其十分注重呈现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揭示对象涉及的多个方面，将对象置入各种背景加以审视。比如京报、新式官报，虽然不是他们的主要研究对象，也使用相当篇幅考察了有关问题。梅嘉乐关注过《申报》等“新报”在版面上翻印京报内容后，京报发生了什么变化；费南山曾收集京报与“新报”售价数据并进行比较以分析它们竞争中的经济因素等。

总体而言，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对新闻史的研究尚未得到足够重视。正如

德国汉学家瓦格纳所言，学术界对中国地方新闻传播业兴起过程仍固守着一种“中国中心观”的特点，所使用的材料全部与中国有关，且大多是清一色的中文资料，丰富的外文资料并未充分地利用起来。同时，对于西方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方法、历史资料以及理论体系和大量研究成果，国内新闻史学界尚未进行系统的研究。

## 第一章 海德堡大学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渊源

### 第一节 研究者与时代背景分析

海德堡大学汉学系自 1962 年起经历创建、萌芽与发展三个时期，其中以系为单位出现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颇具代表性，这一系列研究成果集中出现在瓦格纳教授就任期间。下文将梳理海德堡大学发展历程，教授治学传统，分析该校汉学系研究的时代背景和深层原因。

#### 一、海德堡大学及其治学传统

始建于 1386 年的海德堡大学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其汉学系创立于 1962 年，起初为东方与古代文化学院下属机构，目前隶属于海德堡大学哲学院。第一任教授为德国著名汉学家鲍吾刚（Wolfgang Bauer, 1930-1997），从 1962 至 1966 年间任职于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他一生之中有 16 部学术著作和 69 篇论文，在学术界颇具影响的著作有《中国人的命名》、《中国人的幸福观》、《中国人的自我画像》等。第二任教授 G. 德邦（Günther Debon）以研究古典诗词和翻译《老子》而知名，于 1968 年开始担任自由教师，后担任系主任直到 1986 年退休。1987 年，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Wagner）教授继任，海德堡大学开始扩建汉学系。自此，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得以发展，这与瓦格纳不无关系，因为该校“与大多数欧洲大学一样，是教授治校，教授治所。教授的学术地位、教授的风格、教授的能力，对研究所的实力、风格、声望大有影响。”<sup>6</sup>

瓦格纳教授 1941 年出生于德国中西部城市威斯巴登，以《慧远向鸠摩罗什提出的问题》（Die Fragen Shih Hui-yüan's an Kumarajiva. Phil. Diss. Munich, 1969.）一书获得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并著有专著《宗教在太平天国起义中的作用》（Reenacting the Heavenly Vision: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Taiping Rebellion.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 25.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4.）、《王弼<老子注>研究》（On Wang Bi's commentary of Lao Zi, 2 vols.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2008.）等。

6 熊月之：《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近代中国》1999 年第 1 期。

1989年，瓦格纳教授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建立了合作研究关系，1996年，他被任命为科学院的特约研究员。1992年获得代表德国最高学术研究奖的莱布尼茨大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汉学家。从1993年开始，瓦格纳教授开始将上海纳入他的研究视野，而且他是从公共空间的角度来切入上海研究，陆续发表论文《中国公共空间的运作：太平军的神学和宣传技术》，《外国社团在中国的公共空间中的作用》，《危机中的“申报”：郭嵩焘与“申报”之间的冲突和国际环境》，《道德中心和转变的推进器：中国两个城市的历史》，《中国早期的报纸和它的公共空间》，《进入全球想象图景：上海的“点石斋画报”》，《申报馆早期的书籍出版》和《公共场所和舆论》。<sup>7</sup>他对申报馆书籍出版、《点石斋画报》等研究视角独特，视野开阔，将中国的新闻事业发展置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深入研究，正因为这一系列丰厚的学术成果，瓦格纳教授成为德国乃至欧洲最具影响力的上海研究专家之一。

## 二、“中国公共领域的结构与发展”小组及其研究成果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汉学系主任瓦格纳教授的主持下，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组织起一个名为“中国公共领域的结构与发展”的研究小组，成员包括他的同事或学生，包括梅嘉乐、燕安黛、费南山、叶凯蒂等人。他们对《申报》等早期中文报刊详加考察，如英文版的《一份中国的报纸：上海新闻媒体的力量、认同和变化（1872-1912）》，作者为梅嘉乐；以德文出版的有燕安黛的《只是空言：晚清中国的政治话语和上海报刊》、《为革命话语提供基础：从经世文编到定期刊物（在十九世纪的中国）》、《现代都市的文人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试论〈申报〉主编上海黄协埙》以及费南山的专著《中国新闻学开端（1860-1911）》、《联合对划一：梁启超和中国“新新闻业”的发明》、《读者、出版者和官员对公共声音的竞争与晚清现代新闻界的兴起（1860-1880）》。

正是基于该研究组的组建及其丰厚的研究成果，至2005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举办“研究日常媒体：作为研究对象和资料来源的民国报纸，1911-1949”研讨会时，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对《申报》等早期中文报刊的研究，在该会上引人注目。

## 三、燕安黛博士及其研究成果

笔者主要分析样本《只是空言》是这一系列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者为燕安黛博士（Dr. Andrea Janku），现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中国历史学高级讲师。1987

<sup>7</sup> <http://www.historychina.net/wszl/xlxh/2007-05-11/30180.shtml>

年至1995年间，她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古典及现代汉学、社会学，1990年至1991年在上海学习现代中国文学，2002年至2006年为海德堡大学传统汉学副教授。

燕安黛曾发表过多篇关于中国晚清时期报刊与公共话语空间的文章。在1996年由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史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燕安黛提交了《现代化都市的文人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试论〈申报〉主编上海黄协坝》一文，以“中国文人记者”黄协坝的生平为考察样本，分析了这一时期“文人”向“报人”转化的过程。<sup>8</sup>

发表于2004年的论文《为革命话语提供基础：从经世文编到定期刊物（在十九世纪的中国）》<sup>9</sup>着重探讨经世文和早期中文报刊之间的联系，考察了两者在时间、内容和风格等方面的关联，揭示出报刊论说与经世文的趋同性，以及革命话语对经世文的发展。

《只是空言：晚清中国的政治话语和上海报刊》（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r 19. Jahrhunderts）是燕安黛海德堡大学东方学和古文化研究学系博士毕业论文，2003年由威斯巴登州 Otto Harrassowitz 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经笔者译为中文后共计10万字。该书包含以上两篇论文所探讨的主要内容，即晚清时期“文人记者”形象的个案分析，也包括经世文和早期中文报刊内容的趋同性分析，并在专著中着重探讨“论说”形式的发展，以此探究以《申报》为例的晚清报刊是如何介入中国公共空间，从而改变了中国政治话语的传播模式。她认为，新报刊的创建以及论说的建立填补了言路空白的局面。

这一系列研究以跨文化视角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历程置于全球化进程中进行考察，并探究近代中国公共空间的构建，实则是受到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激发。因此，下一节将阐述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中国新闻史系列研究的理论渊源，即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 第二节 海德堡大学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理论渊源

受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影响，欧

8 杨莹（Janku），《现代都市的文人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试论〈申报〉主编上海黄协坝》，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272-295页。

9 Janku, Andrea (2004), Preparing The Ground For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From The Statecraft Anthologies To The Periodical Pres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oung Pao. 90 (1-3) : 65-121.

美各国学者的专题性著作和论文层出不穷，公共领域与传播媒介的关系受到高度重视，海德堡学系的系列研究也受其深刻影响。

### 一、哈贝马斯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哈贝马斯 1929 年生于德国的杜塞尔多夫，曾先后就读于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最终于 1954 年进入波恩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55 年前往法兰克福大学并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员，“与其他法兰克福批判学派学者不同之处在于，他肯定了启蒙运动关于民主公共生活的理念，并将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看成是改革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模式。”<sup>10</sup>

1962 年，哈贝马斯出版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为对象，研究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及结构转型、政治功能及政治功能的转型。哈贝马斯在该书出版两年后，他再刊一篇名为《公共领域》的文章，对“公共领域”的概念做了进一步阐释：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因此，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的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家活动相关的问题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以之区别于例如文学的公共领域）。”<sup>11</sup>

后来又进一步提出，公共领域有代表型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平民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自由主义模式、福利国家大众民主模式以及文学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等多种类型。

### 二、海德堡大学系列研究与公共领域理论

纵观海德堡大学系列研究，深受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影响，并突破原理论的界线，探究资本主义世界外的发展情况。

综合上述界定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可以看到，哈贝马斯

10 展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 年第 2 期。

11 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汪晖译，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第 125 页。



本人所认为的“公共领域”由三大要素构成——公众、公众舆论、公众媒介。至 1989 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英文版，并相继引发了英语国家对“公共领域”概念的广泛讨论，并且对与之相关的公众舆论与传媒的角色问题兴趣持续渐长，从此成为西方社会主流话语的一部分。

海德堡大学学者则将社会公共领域的构建与中国晚清时期报刊的发展相结合，在探究晚清公共领域构建时，也将分析重点立足于“公共领域”的三大构成要素，即公众、公众舆论和公众媒介。如，燕安黛在分析《申报》在晚清参与构建公共领域的进程时，注意到公众被激发且参与进报刊讨论之中，注意到报刊文体即“论说”<sup>12</sup>的发展形式，并分析媒介如何介入公共空间，成为人民发表个人意见的场所。

综上所述，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中国公共领域的结构与发展”研究小组系列成果理论来源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分析层次也深受其影响。

---

12 “论说”被燕安黛视为晚清中国公众舆论的主要形式。

## 第二章 《只是空言》研究结构及研究方法分析

### 第一节 《只是空言》研究结构分析

《只是空言》一书除了第一章引言外，主体由七个章节构成，作者为了探究中国十九世纪晚期公共政治领域结构性发展的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围绕新报刊是如何介入中国公共社会、论说如何介入晚清政治领域等问题，作者结合了历史分析与话语分析方法，着重分析三大主题——报人、报刊和报纸文本。

针对报人的研究集中在第二章——“中国文人与上海新报刊”，作者重点关注《申报》创办人安纳斯通·美查（Ernest Major）创刊历史和新闻思想、《申报》编辑——文人记者黄协埙生平以及文人团体和他们的新报刊。从结构上可以看出，燕安黛将观察分为了三个部分，第一阶段是外商创报，她认为，美查是上海的第一位现代出版商，从他对申报的设想和《申报》发刊词中可以看出，他为“论”这一形式获得文化性成果创造了先决条件。第二部分，通过黄协埙的生平了解上海文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燕安黛认为，黄是十九世纪末在沪文人记者的核心人物，也是二十世纪早期政治新闻业转型的牺牲品。在第三部分中她提出，从十九世纪开始大量私人学堂建立，这从客观上集结了文人学士，为维新运动时期华人建立新报刊做了准备。在关于中国文人记者的研究中，她提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扬子江下游江南文人大量外逃，该区域文化基础受到破坏，并观察在这一情况下，中国社会如何建立新的政治文化。她提出，上海的繁荣和先进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报刊迅速地发展成为政治话语的新媒介，也正是因为报刊，上海成长为了士文化的新中心，因此在多年战争后，被边缘化的文人能够回到政治文化中心，这使得文人有可能将自己的意识寻求途径传承下来。

燕安黛在她的著作中花了大量篇幅来研究晚清中国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论说。第三章——“政治论说：西方模型和中国模型”，探讨在中国语境中，“论说”形成的背景，她既关注到早期英美主导的宗教报刊和商业报刊对论说形成打下的基础，也关注到经世文学对新报刊的影响。在第四章——“旧式‘言路’与中法战争时期的新报刊”中，作者将 1884-1885 年上海报刊关于中法战争的论战作为例子，展示新媒

介如何在既定言论机构之外发挥政治影响力。对《申报》“论说”模型和修辞的分析集中第五章“修辞的网络：1898年的改革论战”中。作者认为“论说”面临着双重矛盾，它既存在于一种新的媒介公开语境下，但又要继续受到半官僚机构中文学—政治话语的表达约束。<sup>13</sup>

针对报刊的研究集中在六至八章。第六章是“经世散文与新闻文体的趋同现象以及人民的新角色”，作者以三篇不同文章为例，展示出维新文体的变化，同时注意到该文体对经世散文的继承，并从内容中分析出对“士”阶层态度的变化。从一开始将士看作是国家之元气，认为清王朝所遭遇的国家危机是因为士阶层道德沦丧所造成的，到对士阶层的蔑视，从而不再呼吁重建该阶层的文化道德，最后到赋予“民”新角色，至此人民成为国家新希望、报刊新主角。

第七章是“朝代危机和改良的结束”。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谭嗣同等人被杀，在此之后，慈禧进一步打击报刊，在此过程中，上海报刊生存状况以及报刊角色的转变是作者的分析重点。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论就作为政治话语的媒介建立了，也成为了中国报刊上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通过以上几章的例子和分析中可以看出，论说深受古文和经世散文的影响，记者的表达也受到束缚。

在第八章中，记者通过对建立报刊法的要求、江浙两省铁路权之争的例子提出论说发展成现代概念“社论”是在1907年，并分析了“社论”这一概念的建立和意义。

## 第二节 《只是空言》研究方法分析

本节笔者将结合实例分析燕安黛《只是空言》一书的研究方法，并分析该研究方法对新闻史研究的意义，进一步打开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思路。

### 一、文本分析法

《只是空言》一书中作者燕安黛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文本分析法。文本分析法属于定性研究方法，是质化研究，旨在运用符号学、结构主义和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文本的结构与意义，对文本内容进行不断的挖掘与发现，探索意义的不同解读方式和文本中所隐藏的意识形态力量。

燕安黛通过关注晚清时期《申报》等报刊及其文字产品，通过归纳总结，将零散

13 见燕安黛《只是空言：晚清中国的政治话语和上海报刊》引言部分。

的文本内容和细节进行分类和概念化，并找出了这些刊物及文字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得出研究结论。

例如，在《只是空言》一书第 219 页，燕安黛将道光年间翰林院庶吉士孙鼎臣的《论治三》结构及文字运用列表进行分析展示：

A	导论： 1. 谷物的比喻 2. 汉朝和宋朝的例子 3. 对现在的分析	对过度反应的警告 结论：过度反应的规律 士气缺乏，定义：士气=国家之元气
B	1. 明朝的例子 2. 苏轼名言 3. 原因：明太祖的政策	明可以存在这么长时间，是因为明朝养成了蓬勃的士气。 太祖知立国之本（反问：那么满族皇帝呢？）
C	反对方的讨论： 1. 论者 2. 辩驳 3. 对清政策的分析 嗟乎！ 夫	东林批判要为明朝衰落负责。 如果没有正确的批判，明朝灭亡得会更早。 明的政策产生了对士气的抑制，清的政策导致了士气的衰竭。
D	总结 夫 1. 对比：气——水 2. 类比：谷——士	对过度反应的警告 正如人们需要粮食以活命一样，国家要存在需要的就是士。

随后在 230 页将 1898 年 5 月 19 日刊于《申报》上的《论报纪凌辱斯文事》一文用同样的思路进行分析、展示：

A	1. 前提：士的一般角色 2. 他们实际上道德的沦丧：古代——明/清——现在	士为四民之首，穷则教人，达则治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B	1. 报道 2. 报道	知为斯文而辱之
C	讨论： 说者谓然	罪魁祸首是有过失的。 文人缺乏自尊心。
D	结论 1. 关于罪犯 2. 关于文人——孟子引言	由于差役等人的专横跋扈，严苛的惩罚是合适的。 被凌辱是咎由自取的。个人层面与国家层面的相关联系。

通过分析与归纳，燕安黛发现了报刊论说与中国古代经世散文结构和文字运用方

面的内在联系，一方面，提出可以“将十九世纪末期的改良讨论视作是治国散文与报刊媒介相结合的产物”，发现报章文体与治国散文的趋同现象；另一方面，她分析出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两类文体之间思维角度的差异，“孙鼎臣这样的作者[……]所关注的是士阶层的觉醒，以及自身的政治角色”<sup>14</sup>，但《申报》等报刊刊登的“论说”则逐步注意到了士阶层的危机，形成了对士进行批判的概念。<sup>15</sup>

除上述提到的两篇文章外，燕安黛还全文翻译了1884年11月21日《申报》刊文《论言责之难尽》，同年9月3日《申报》文章《论时势之岌岌》，1898年9月28日的《论中国之弱由于民智不开》，10月24日的《论康有为大逆不道事》，同年10月6日《新闻报》的《愤录范睢传》及《新闻报》10月12日的《论康有为》，并对这些文献进行了文本分析，深层次挖掘文本内在的信息和逻辑。

## 二、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分为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其中“纵向比较”是新闻史研究中最常规的一种研究方法，指主体不变，以时间为轴向将单个事物与过去某个时间节点的状态进行比较，意义在于比较同一事物不同时期的形态认识其发展变化的过程，揭示其发展规律。

而“横向比较”则是比较研究方法的扩展应用。它是指“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接触与交流的基础上，适应各国对自身全部历史活动进行总体把握的需要而产生的。”<sup>16</sup>程曼丽认为，这一方法意义在于有助于研究者拓展思路、扩大视野，有助于消除认识上的偏差，有助于增加研究深度。有学者指出，新闻历史的横向比较研究，究其本质理应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是研究新闻系统中不同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二是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第三是新闻系统跨地域的互动关系。<sup>17</sup>

本书中燕安黛充分利用了比较研究法，除了史学常见的纵向研究之外，作者充分运用了横向研究法。

如，尽管作者主要观测样本为《申报》，但在《只是空言》一书中大量比较同一

14 Janku, Andrea, 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p.206.

15 Janku, Andrea, 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p.254.

16 程曼丽：《横向比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思路》，《新闻大学》1997年01期。

17 张昆：《横向发展——新闻史研究的新维度》，《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04期。

时期内《申报》与其他报刊的办报理念、文章思想的相似与不同。例如，1884 年中法战争期间，针对和平或是战争的国家决策议题，《申报》与竞争对手《沪报》以及读者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作者燕安黛通过分析比较认为，这一场论战说明了晚清中国新言论机构出现的必要性，以及报刊与中国公共意见领域构建的关系。<sup>18</sup>

再如作者将中国论说与西方社论进行对比，将新报刊与士阶层进行对比，这一研究方法将中国晚清新闻史上“点”的问题提高到“面”上进行观察，找到个性之间共性的联系，既注重了个体的研究，也从个体中归纳总结出晚清中国公共领域形成的原因、发展和结果。

---

18 Janku, Andrea, 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p.98.

### 第三章 《只是空言》新闻思想研究

上文提到，围绕新报刊如何介入中国公共社会、论说如何介入晚清政治领域等问题，燕安黛结合了历史分析与话语分析方法，从主题上来说，报纸、报社员工及其文学产品是其分析的重点。

#### 第一节 从“空言”到“舆论”——报纸作为公共意见载体参与政治进程

报刊在晚清的政治讨论中逐渐成为一个具有权威性、受尊重的机构，报上“空言”也开始受到政府、人民的重视，然而这一过程是充满了矛盾与冲突的。燕安黛对于报纸参与政治进程的过程进行研究，从对下、对上两大方向上注意到报刊功能性上的革新。

##### 一、于下，信息达民从而形成对既定机构的替代

1884 年，中法战争矛盾进一步激化，朝廷中分裂出两个派别，一些人支持中国继续开战，另一些人则支持签署和平条约。为防止朝廷政策制定受到干扰，慈禧在 1885 年 1 月中旬封闭“言路”，清议官员被迫保持沉默，直到 1885 年 6 月 9 日在天津签署和平协议，冲突得到正式解决后，“言路”才再次打开。在这个过程中，《申报》对战争不加修饰的报道成为人民可参与公共讨论的一个重要因素。

政治议题公开讨论的前提是信息的可接近，而《申报》则致力于满足这一条件。正如报馆座右铭“有闻必录”所言，他们致力于细致的报道，并且尽可能地展示信息来源。例如，美查曾派了一名俄罗斯战地记者到越南去，他积极获得一切来自于官方的、非官方的、中国的以及西方的原始资料，不管是香港报刊上刊登的关于越南战况的报道，还是海员们、商人们的私人信件、目击者报道，《申报》都会刊登。该报尽最大的可能接近现实。战争爆发之后，首次推出了号外，且通常都是表明信息来源，让读者自己评价报道的可信度和重要性。

而中法战争并非该报首次吸引大量注意力和受到广泛讨论的事件。在《申报》建立的第一年里，该报就已经有了关于华工苦力北美贸易的讨论。因此当 1884 年对法冲突尖锐化的时候，报纸早已成为公共讨论的既定方式。

但燕安黛通过对 1884 年 1 月至 1885 年 3 月之间，《申报》上关于中法战争讨论文章的数量（包括读者投稿）进行统计后，提出她的观点：这是第一次主要通过报纸对报道和评论的参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公众广泛参与的讨论。<sup>19</sup>

以此，她将报纸视为“既定机构”的代替——这个既定机构即是指传统中国社会的言官。“言路”对于中国政治文化一向具有重大意义。它代表着一种向朝廷谏言的合法方式，通过它能够保证“上下”的联络、政府和人民的交往。特别是在危机事件发生时，更要广开言路保证充分倾听国家批判的声音，特别是士的言论，以此来阐明弊端，维持一个“良好政府”的平衡状态。在一般情况下，它是一种官方机构内部批评的制度化形式。

燕安黛认为，中国传统“言路”的控制权掌握在国家乃至个人手上<sup>20</sup>：清政府既可以广开言路，同样也可以阻塞言路；皇帝可以宽宏大量地接纳谏言，也可以因为格式上的小小错误而拒绝请愿书。与此相反，政府对于上海的出版物并无直接控制。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康有为的请愿书被驳回后，报纸上、新创建的改良杂志上讨论继续进一步发展，对改良的需求得到进一步表述。

## 二、于上，报刊担当“新国民”监督政府

在燕安黛看来，报刊参与进公共领域的讨论当中是具有双重身份的，除了上述提到的之外，另一方面，报纸在面对政府时充当的是“新国民”角色。

燕安黛以 1907 年铁路冲突权的事件为例，认为报刊展示出其新角色以及出现了“国民”新身份，在这里，报刊作为社会交流和宣传动员的媒介，发挥了惊人的作用，同时这一过程与“社论”概念的发展具有一致性。<sup>21</sup>

实际上，在梁启超 1896 年提出“耳目喉舌”论之前，古代中国的报刊就已在实际上形成了“耳目喉舌”的事实行为。吴廷俊教授曾提到，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国家机器利用刊行官报来保持运转，这是为了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要达到“政令畅通”；第二点，要做到“举国‘听一’”。“官报就是迅速传达政令的一条很好的渠道，也就是宣达皇权、统一行动最好的手段。”<sup>22</sup>“中国的古代官报……都是封建统治阶级为

19 Janku, Andrea, 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p.128.

20 Janku, Andrea, 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p.3.

21 Janku, Andrea, 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P233.

22 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4 页。



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创设的舆论工具。”<sup>23</sup>

也就是说，尽管古代中国的报刊有一定程度上“耳目喉舌”的行为事实，但在其中占主要地位的官报是由统治阶级所掌握的舆论工具，而现代意义上的舆论是指公众舆论，强调的是私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公开讨论。因此燕安黛认为，报刊首先担当了新国民的角色，从而促进国民意识的逐步觉醒。

在分析了1907年《中外日报》和《神州日报》上两篇关于争夺铁路权的文章后，燕安黛认为，这一时期报刊论说主题主要针对的是国家主权问题，与前一阶段以“大清帝国继续存在”为前提的讨论有了明显区别，并且报纸开始将人民视作一个集体，鼓励读者团结一致，赋予舆论实际力量，实现与中央的抗衡。<sup>24</sup>显而易见，报刊以前追求的是上达型的垂直交流体系，但这个时期报纸演变为了一种水平交流工具，从而实现了社会动员新策略。

### 三、国与民之间，报刊构建沟通平台

燕安黛认为，报刊能够在这个时期介入公共空间，是因为报刊在该阶段构建了国与民之间的沟通平台，从深层次上来说，她认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 （一）基础：西方报刊媒介的传入

史学上认为，改良派创立的政治期刊出版物出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出版物的开端。但燕安黛认为，在条约约定的开放口岸早就创建了商业报刊，他们也是作为政治工具运作的。<sup>25</sup>在1895到1898年期间展开的改良讨论中，除了专门的改良派报刊外，早已建立的商业日报和传教士刊物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她提出，“清代的改革不是以1898年的百日维新为开端的，也不是以1895年改良派报刊的起始作为开端的，而是在19世纪70年代，随着掌握了西方报刊媒介，通过先进派在开放港口、在南方沿海省份将这些报刊作为公开政治交流的工具，从而使改革论断赢得了显著支持和动力为开端。”<sup>26</sup>

所以，按照燕安黛的观点，早期的传教报纸以及商业报刊已经具有卓越的政治报刊形态。十九世纪早期，作为当时一种新媒体形式的报刊由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关口城

23 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24 Janku, Andrea, 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p.344.

25 Janku, Andrea, 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p.3.

26 Janku, Andrea, 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p.8.

市进行试运行，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它在中国开始站住脚跟，这种媒体在对外交流报道方面迅速赢得稳固地位。

之后，中国的外国商业报刊创办，而后陆续也有中文出版物创刊，首先在香港，之后在宁波，最后上海也开始创办。随着这些新型报纸的创办，一种关于政治议论的固定报道模式也开始建立，这些报道既不属于国家范围也不属于私人范围。上海作为一个经济繁荣的国际开放口岸，远不在清政府的势力范围之内，同时，它在江南范围之内，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几个世纪以来从这里走出来的士大多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就，这些条件为上海提供了经济和文化资源，更进一步说，为上海发展新的媒体形式提供了绝佳环境。

简言之，燕安黛认为，西方报刊在华的发展成为了报刊政治身份发酵的重要前提，随着西方教会报刊以及商人将现代报刊引入中国，政治公开新形式的第一个条件成为现实。

## （二）催化剂：政治意见表达的困境

在中国古代的现实政治生活中，朝廷官员在呈请请愿书和谏言时，存在着强有力的管控机构，通过机构个人的表达可能会被过滤、疏导，因此，这种机构内部的批判形式明显与现代“公共意见”的概念有区别。

正因为仅能通过官方途径个人的批评和建议才能被接收，也只有如此才能对现实政治施加影响，所以每一种私人的表达如果与国家范围内主导的话语体系有分歧，而它又对公众产生了影响力，那么表达者就会面临着危险，并且会遭受迫害。这一种危险在外忧内患的晚清时期进一步加强，因此燕安黛认为，正是因为政治意见表达机构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困境，所以才会催生可作为公共话语空间的报刊。

将清议作为一种政治的异议来解读，并将之视为一种全新的力量，是晚清时期的一种新现象，它最重要的媒介是报刊。例如燕安黛提到的《申报》，它巧妙地避开了政治矛盾，就其形式来说，它算得上是政治公共舆论领域的非法声音——因为它公开地讨论有争议的话题，但同时它又要求自身以严肃的态度向国家政治进程做出相关贡献。

这与其他海德堡汉学系学者研究观点具有一致性。“在中国，外部和内部因素都在努力唤醒新的信息需求”<sup>27</sup>，国内外政治冲突技术上导致了原有的政治表达模式解

---

27 Vinttinghoff, Natascha, Die Anfänge des Journalismus in China (1860-1911), p.5.

体，从而让报刊介入公共领域有了空间与裂缝得以发展和实现。

### （三）保障：同一话语体系形成统一民族共同体意识

首先，报刊传播新思想，开民智，这使得报刊讨论拥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为舆论的形成打下基础。

燕安黛认为，基于改良议程，“中国如何富强”成为十九世纪晚期最大主题，该时期，“老派”文人学士与“新文人”的利益相碰撞：经世文人所关注的是现有体系的维护，洋务派则希望促进军事和工业的现代化，之后又与维新派进行辩论，在这个过程中，报纸作为论战媒介，传播了新思想。其中，最明显的是对“民”角色认知的变化。<sup>28</sup>

在世纪中叶，普遍认为，国家的危机是与士阶层的危机紧密相连的，因此关注的议题是士阶层的觉醒，呼吁重建士阶层的精神道德世界。但通过在报刊上进行人民教育的一系列讨论后，“民”的概念得到重新评估，提出要从智力和道德两方面改善民的质量，以“新民”来代替士的地位<sup>29</sup>。其次，1895年，进化论理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开始为人熟知并得到广泛宣传。通过报纸刊登这些论战，这些来自西方的新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深入人心，甚至在1898年改良运动失败后，这些思想仍然持续发挥作用，也为后来的革命思潮打下思想基础。

同时，报纸在民族主义思潮逐渐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领导角色。根据本尼迪克·安德森的研究，从19世纪开始，“印刷资本主义”导致了基本精神的形成，这样的精神为民族主义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同时，报刊也成为了一个民族中“想象的共同体”概念与共同特征之间的中介，通过阅读一份报纸，读者共享着同样的时间、地点和语言。<sup>30</sup>

也就是说，报纸发展出了作为民族主义生产者的意义，不过他这一认识有所争议，因为安德森将民族主义这一现代现象阐释为从西方进口的新东西，同时忽略了强烈的民族精神可以追溯到本地的、土著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现代新闻学才是民族主义实践的工具，这一工具同时既是舶来的又是传统的。

燕安黛认为安德森的研究结果同样适用于晚清中国的状况，因为报馆聚集了由发

28 Janku, Andrea, 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p.28.

29 “士为四民之首”思想反映的是皇权社会的等级结构制度，维新派在讨论中提出民对士的代替并不只意味着两个阶级地位的改变，实际上也反映出君主立宪制度下国家核心力量的转移。

30（美）安德森（Anderson, B.）著；吴睿人译：《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

行商和读者组成的共同体，他们发表对于国家危机状况的报道，话语体系显得相对单一，因此也可看出他们致力于与读者共建志同道合的共同体。而且，报纸从一开始就以“民族”问题、外国人在华的内政纷争、国际贸易和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地位为主要话题，毫无争议地，它是要将自己作为民族主义话语的传输介质。但是同时也应当在注意到，因为活跃于报端之人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所以“报”的产品从一开始就暴露在不同的利益之中，为解决危机所提出的建议也各不相同。也就是说，在以“民族主义”为统一核心的话语体系之中，各类报纸实际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传递着不同的价值观念。

## 第二节 从“论说”到“社论”——公共政治话语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通过梳理本书发现，燕安黛认为报刊带给晚清中国社会政治讨论领域结构性转型，主要是通过将“论说”打造成公共政治话语这一方式，从而《申报》等报刊能够填补当时“言路”失效的空白，改变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话语传播模式。燕安黛在《只是空言》一书中，花了大量篇幅来阐述论说的建立，分析论说的模型及其发展。

### 一、论说建立

燕安黛认为，《申报》将“论说”作为英国市民报上 leading article 概念的中国等价物确立下来，最晚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同时她提出，“追溯这种文学新种类时，总会提及政论、汉代的史论或史评……在 1898 年一份纲领性的文件中，‘论说’还是被含糊地分类在传统古文中……它存在于文化混杂交融的地区，却试图用纯粹的传统中国文化框架去解释，这是不合理的。”<sup>31</sup>她否认了“论说”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学种类，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经过研究她提出，西方宗教报刊和商业报刊为“论说”的建立提供了基础。

实际上，在第一期《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上，就已经有了以“论”为题的小文章，但这两篇“论”的表达皆为道德批判的表达。三十年后，美国南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在上海出版了《教会新报》，头两年中主要刊印圣经故事，后来也出现了涉及时事与政治的诗歌和文章，其英文目录中称这部分为“leading article”，但中文目录中

31 Janku, Andrea, 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p.51.

并未对应的词语。

后来被称作“论说”的这类文章，最初是《华北捷报》(North-China Herald)的一个组成部分。<sup>32</sup>

《华北捷报》是上海第一份现代商业报刊，该报头版版面位置留给广告和教堂公告、讣告、会议通知、来港船只广告及领事馆声明等内容，论说通常出现在第二页，基本没有标题，包含了编辑对当前时事发表的提示和解释，或是对报纸上刊印的重要新闻和信息发表评论。但《华北捷报》的问题在于，它是一份英文报刊，所针对的多是外国侨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英国政府的立场和观点，因此论的形式并未得到普及。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官方机构以及半官方机构之外，出现了一个在公开场合谈论政治问题的机构，这可谓开了先河。以《华北捷报》为例的报纸，也为后来非官方机构政治进程提供了范例。”<sup>33</sup>这种交流结构在水平上表现为，运用“editorialen Wir”(我们编辑)这类词强调自己是站在所有普罗大众的立场之上，凝结读者利益；从垂直结构上来说，报纸希望对政治问题能向政府提出建议。

燕安黛通过对早期出现在大陆的报刊进行梳理后认为，《申报》的美查是中国“论说”形式建立的先驱者，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申报》多聘请中国人，在编辑发行过程中将意识形态和政党利益排除在外，将商业利益放在首位，这使得《申报》读者群较以前的报刊来说，得到扩大，也更容易吸引读者寄送稿件，发表观点。

其次，该报每日将论说登于头版。第一年中，读者寄送的稿件大多关注公共道德，如论及卖淫、鸦片、赌博、贩卖苦力等伦理问题；接下来的几年中，关于政治话题的文章份额增加，题目多为“引”、“论”、“说”。1892年，英国著名汉学家翟斯理在字典中将“作论”解释为“书写社论”，以此确立了论的新意义。

第三，《申报》的“论”以信息为基础，强调独立报道。从1874年日本远征台湾事件到1884年的中法战争，《申报》一直坚持准确的、未经美化的报道，而且通过电报传送诏书，迅速刊印，保证了信息的时效性，从而保证论的质量。

简而言之，燕安黛认为，从内容、版面和受众群来说，《申报》将“论”提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重要位置。刊登“论”的意义在于，将只出现在官僚机构内部的政治

32 Janku, Andrea, 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p.63.

33 Janku, Andrea, 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p.63.

讨论公开化、公众化，这使得该报在上海开创了中国新闻与公众批评的新时代，在民间出现了一种日渐成熟的政治交流形式。

## 二、论说模型分析

论为何能成为可被接受的讨论对象，这与它的形式密不可分。燕安黛通过分析大量报章文体发现，从结构上来看，中国语境下的报章论说具有形式化表达：起承转合——导言，说明，对照和总结。

她在分析中发现，导言部分多为对古代经典文本的引用，这是为了证明作者的观点与正统价值观相吻合。比如，在二十世纪前十年关于立宪的讨论中，最受欢迎的两大引言来源是《孟子》和《尚书·洪范》。在说明部分，要对圣人的话进行展开，从中提炼出一种观点，也就是作者的论点。紧接着转变口吻，作者对自己的论点进行论证，这是文章的主要部分。在总结部分要得出结论，并与开头的引文相呼应。

“过去与现在的对比也是论说的一种标准开头形式”，例如，在“阅本报纪仕途须知一则推广论之”一文中，写道“古之仕者以行道，今之仕者以梯荣，古之仕者以立功，今之仕者以牟利，古之仕者以戮力于君国，今之仕者以自肥其身家。”<sup>34</sup>论说作者将具有价值和理想的“古”与堕落、追求物质利益的“今”相对比，类似表达也常见于大量古文典范作品以及皇朝经世文编中。夏商周三代文化繁盛，自秦始皇后开始衰败，这样的对比模式与引用古文、历史典故一样，都属于批判性表达的语言编码方式。在晚清文章中，隐藏在文本背后的并非是“一种崇高的政治理想”<sup>35</sup>。也就是说，对黄协埙以及他的同事来说，使用该表达模式，也许并非出于对重塑古代文化巅峰这一理想的执着，或是因为对现世的极端失望情绪，运用惯用语句是为了确认自己和正统思想站在统一战线。

据其观察，在 1898 年改良热潮中尤其多见的评论主要有两种类别，诏书评论和消息评论。首先，诏书的评论也具有上述相似表达，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皇帝官方通告的程序化特征。在 1898 年 5 月至 10 月期间，出现了十三篇以“恭读（……）上谕谨注”为题的文章。《申报》上诏书评论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使诏书无删节地与论说成为一个整体。在封建社会中，皇权拥有绝对尊严，禁止公开争论，因此对诏书的批判只能保持一种不明言的状态。利用诏书的评论，记者主要是替当局履行了“向下彰

34 Janku, Andrea, 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p.163.

35 Janku, Andrea, 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p.164.

显帝王美德”的职责。<sup>36</sup>

在消息评论上记者则能充分发挥主动性。消息评论题目通常为“论报纪……事”、“阅报纪……推广论之”、“越……引申言之”、“读……有感而书”，如果是涉及到某份文件，则为“书……后”。消息评论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经典引文的束缚，在提出观点或建议时，使用代词“吾”——和《华北捷报》“我们编辑部”的用法类似，增强读者感情凝聚力。此外，消息评论最后常常变成一种自我反思，结束于对中国状况的控诉，以及对“当轴者”的建议。<sup>37</sup>

燕安黛还观察到，“论说”中有一种符合现代情况的修辞手法——佩尔曼在他的论证理论中将之称为“伪推论”。具体有两种主要表现形式：第一种，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提出“论者谓”，再从作者角度来“释其惑”，以传递“说者”或“执笔人”的观点；第二，“教育谈话”，在《孟子》、《管子》等不计其数的经典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些对话通常以学生对老师的咨询开始，或是王侯就某个问题向言官发问，这类伪推论以设问开篇。“从修辞学来看，伪推论制造了一种假象，那就是自己的观点在讨论中形成，并经过了反对意见的考验。”<sup>38</sup>

论证除了平衡、严谨的结构以及保守的语言使用外，也包含了文学元素，其中对比与类推具有重要的地位，例如“窃谓，中国日今时势，譬犹数抱之树，形质徒具，中心已亏，偶有萌蘖之兴，壅之培之，尤惧不克长养，若再加以摧折，生机不将因之绝乎。”一句中，将中国的状况比作“数抱之树”，对下文揭示弊病做了形象生动的铺垫。<sup>39</sup>

燕安黛将 1898 年报刊文本作为“论说”模型分析的样本，是因为“旧”《申报》上受政府批准的改革讨论在该年达到最后高潮。美查早已离开中国，黄协坝是当时《申报》的编辑，他深受中国古文及经世风格影响，向政府发出呼吁的模式也是在此时确立了一种公式化的表达形式。之后这种模式又机械化的为更多记者采用。同样，在 1898 年的改良讨论中，论的表达始终和呈书的口吻一致，由此看出，不论是激进的改良派，还是普通的读者来信，他们所希望的是自己的批评建议可以“上达”至政府，

36 Janku, Andrea, 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p.169-176.

37 Janku, Andrea, 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p.176-179.

38 Janku, Andrea, 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p.180.

39 Janku, Andrea, 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p.198-199.

这种表达的矛盾之处在于媒介始终是一种要面向公众进行广泛传播的工具。随着改革的失败，异议被激化。通过二十世纪初报刊进一步多样化，同样也通过这些报纸语言和风格上的革新，最终《申报》也被迫进行改革。

### 三、从论说到社论：政治社评的现代表现形式

德国著名汉学家鲍吾刚先生也曾对社论有所观测，他“在关于中国日报的研究中写道，（改良后的新）《申报》‘在 1905 年 2 月 7 日首次刊发社论’”<sup>40</sup>，但燕安黛通过对“社论”一词内涵的研究以及同时期其他报刊的梳理发现，“社论”这一现代概念首次运用是在 1907 年 1 月 5 日，最初引入该概念的是《时报》，《申报》实际上刊登真正意义上的“社论”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随着《时报》的创建，时评以及短评等不同形式得以引入，评论形式变得多样化，也包括幽默小文和讽刺漫画，文体上也越来越口语化。《时报》在它的栏目标题上明显区别开来社论和论说。前者必须来自于编辑，权威地代表着报纸的立场。在“论说”（偶尔也叫“代论”）栏目下，则刊登外部人员的文章。

实际上，“社论”概念来源于日本的“社说”，它是由激进的改良派和革命人引入中国的，现代中国社论的概念是日本“社说”与中国“论说”的融合体。“社”这个新概念指的是一个集体，通常情况下是指报社，且该字代表了社会本身。因此，《时报》的“社论”是一种编辑代表社会发表见解的行为，而“论说”则更多的是读者来信。

《时报》引入现代“社论”概念，实则为报刊政治评论打开了新的格局：

“《时报》的社论是无党派的，主题为国家、社会之重大问题，[…]，使得报纸成为了一种适宜于推动社会进步的媒介。《时报》……的新外观和形式为已建立的《申报》、《新闻报》提供了范例……随着《时报》的发行，中国‘现代’报刊的样式得以确立。随之而引入的‘社论’，也让新的社会力量在中国公众领域中获得象征性地位。”

也就是说，从论说到社论的转变，实现了公共话语体系的转型，编辑意见形成了对舆论具有影响作用和领导作用的有力评论形式。

---

40 Janku, Andrea, 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p.248.



### 第三节 从“文人”到“记者”——晚清报人政治意识的觉醒

在中国政治历史上，“言责”是儒家官员最重要的任务，在实际政治中，最直接、也是唯一符合标准的正式言路就是官员书写、呈递的请愿书。所以“清议”被理解为一种道义上的批判，其批判基础是对个人的道德评价，这样就导致它无法客观表述批评和建议，甚至逐渐退化成为政治机会主义的工具。<sup>41</sup>

作为政治媒介，报刊基本上在两个方向上活动，一是“上达”政府，二是强有力地影响读者。在此过程中，文人的记者意识开始觉醒，这是报刊介入公共话语空间的必要前提、也是必然结果。

#### 一、文人记者形象重构

晚清时期新闻业从业者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他们要将本土知识体系与西方进口的新兴技术进行结合、转化，并以新的方式将这些知识带给公众，这意味着他们既要有传统的思维框架，又要具备很强的跨文化能力，但“记者被妖魔化、丑化，或者被认为是没有受过教育、不称职、无用的人，这种刻板印象，在几乎全世界所有的报纸文化中都能见到”<sup>42</sup>。

这一思想贯穿海德堡大学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成果之中，比如费南山就认为，这是因为记者担负着对社会公共舆论进行评论的职责，因此其地位一直饱受争议。既是“无冕之王”，又被妖魔化，她认为对记者这一形象刻板的史学认识是需要修正的。

燕安黛倾向于个案研究，她以十九世纪末在沪文人记者的核心人物黄协埙为研究案例。黄是《申报》的第三任编辑，同样也是二十世纪早期政治新闻业转型的牺牲品，<sup>43</sup>燕安黛在著作《只是空言》的第二部分通过黄协埙的生平剖析了上海文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提出对文人记者形象及生存状况的重构——早期报人由不得志之文人构成的传统认知与实际现实有所偏差。

她提出，随着上海成为“另一个中国”的形象代言，它对于那些在天平天国政治灾难后被边缘化的江南之士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文人是有意地选择了上海。

在这些吸引力之外，现代印刷活动和出版物的发展为他们一方面提供了物质条件，一方面提供了精神条件，在他们选择上海作为第二故乡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在这些低等级文人的传统环境中，他们能获益的最大活动范围是参与法律诉

41 Janku, Andrea, 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p.88-91.

42 Vinttinghoff, Natascha, Die Anfänge des Journalismus in China (1860-1911), p.10.

43 Janku, Andrea, 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p.33.

讼——即“讼师”。这些活动从中国传统道义上来看是处在政治的边缘地带。与此相反，在报纸编辑部工作再次将文人的天职和目的带回他们身边了。

上海不仅是一个“国际化的现代都市”，它也是中国耻辱的印记，与那些文人主要来自的“传统村庄或小城镇环境”不同，上海提供了一种讨论国家命运问题的可能性，尽管这只是在小范围之内的可能性。在八十年代，上海对那些视社会责任与政治责任为己任的优秀分子来说具有十足的吸引力。随着他们做出来到上海的决定，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边缘化了，反而踏入了社会的新中心，政治活动的积极性也随之增加。

她的这一思想也体现在其论文《现代都市的文人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试论(申报)主编上海黄协坝》中，相较传统上认为失意文人才会选择做记者不一样，她认为报纸是“都市文人的游戏场”，是其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园地；也有准官方的文化借用，如文人在报刊上参与议论国家大事，发挥着“新式言官”的功能。<sup>44</sup>

## 二、文人记者精神剖析

“政治危机急剧地缩小了清议的意见范围，因为有人敢冒险向皇太后进言或是警告实属罕见。决策过程的结果是严肃的，文人学士意见的强烈程度和一致性的比例是受到限制的。”<sup>45</sup>

“士为四民之首”——这个源于《圣谕广训》的表述在社论中总是看到，文人记者将之视为必须条件，对于自己的社会角色他们一再保证：在文化中，学者们被视作文化完美性的看护人，他们为天下无私地负责，在现代的语境中，他们也被视作中国民族的救世主。正如在一篇题为《秀才以天下为己任说》的文章所表达的那样，范仲淹的箴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哪怕至今都还坚守的政治想法。这种将文化历史视为天职的英雄式表达，成为了选择做记者的理由。

《点石斋画报》曾描述了一位法国记者因为坚持公正报道而惨遭杀害的故事，其不畏权贵、不顾后果传播真相的形象与所谓“正直”官员形成了对比，但他却遭到法国当权者的杀害，他的遭遇成为了中国政治现实的象征。<sup>46</sup>文人记者普遍认为，“言责难尽”，国家最大的问题在于官员沉迷于自己的利益和事业，因此需要一个新的独立机构来接管其责任，这个新机构必须敢于直言，并独立于权力机构，不用考虑仕途

44 周婷婷，《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早期中文报刊研究概况》，《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45 Janku, Andrea, 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p.89.

46 Janku, Andrea, 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p.92.

和政治机会——而报刊正能填补这个缺口，记者也能尽新言官之责任。

社会和经济的改变导致了新的社会精英阶层的形成，他们开始用新的品质来定义自我，也就是说，无关经济资产，也无关对于传统定义上对权利的渴求。这些新的社会角色在传统的垄断性交流体系中寻找空间，在新的媒介技术发展进程中展现自我。

## 第四章 评析海德堡大学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特点及不足

燕安黛《只是空言》作为海德堡学系的代表作之一，本章将综合《只是空言》及其他海德堡学系中国新闻史研究，客观全面地认识海外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优势及不足。

### 第一节 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系列研究特点及启示

燕安黛及其同期研究者在大量搜集、分析一手材料的前提下，以新闻意识主导新闻史研究，并在文献的支撑下得出系列独树一帜的研究成果。本节将结合实例，具体分析其研究优势及特点。

#### 一、一手材料详实完善

因为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原因，学者很难直接接触到晚清时期日报的原始文本。例如，在《循环日报》创刊的前十年中，现存的只有也就有 1874 年二月到八月的，1880 年二月到六月的以及 1883 年-1885 年间的，十分不完整。此外，截止海德堡学系系列研究成果面世，上述提到的几年间的报纸仅被报刊史学家卓南生在英国图书馆发现十多年，这意味着到当时为止，大多阐述已经不能够由第一手来源所支持了。

对报纸文章语境很重要的首先是当代中国的、外国的报纸，因为在多数情况下，第一批报纸相互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对话和互动，如果没其他报纸对应的参考或是反对文章的相互呼应，许多文章内容往往无法理解。

但有时向其他与之对应的报纸寻求支撑也具有困难性：例如，与《循环日报》同时期的《华字日报》（1872-1941）1872 年到 1895 年的全都丢失，《中外新报》（1858-1918）也是如此。

但海德堡学系的研究突破困难，尽量多采用一手来源，这是因为相比国内学者，他们有条件利用更多渠道。比如，晚清时期大多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由于种种原因要向上级或是公司提交报告，所以目前能在国外资料里面找到大量关于晚清中国报馆的信息，可以看到关于报纸上讨论、论战的详细资料。首先，费南山明确提到办公室公共记录文件的运用，例如在 F0 和 C0 办公室里的文件都含有关于上海和中国其他大城

市社会政治生活的宝贵信息。此外，由于传教士和记者之间的密切合作，教会也能够提供报纸建立、销售和讨论的关键数据，伦敦传道会的档案馆有着有关宗教印刷物经营、买卖的丰富数据。伯克利的傅兰雅档案馆则有这些上海记者和翻译家们信件往来的全面收藏。1877年和1890年教会的详细记录，或是如“广学会”这类的传教团体的报告同样能够提供参与其中的积极活动家的地位和角色信息，或是在他们关于时事讨论的介绍中，展示出参与报刊市场的人员面对时代问题时的眼界。

此外，海德堡学系系列研究中，作者们尽力避免报刊历史的简单分类，这也是为了能够呈现出报馆活动的复杂图像，所以他们的研究组合使用了相对不同的源材料。

正如燕安黛《只是空言》一书所示，其主要研究的问题是《申报》如何填补晚清时期言路空白，但她并未局限于此，而是大量阅读、总结了同时期的其他报纸，如《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等一系列宗教报刊、《北华捷报》、《沪报》、《新闻报》等报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横向上的比较分析，甚至观察到同时期英国《泰晤士报》是如何评论中国公共社会的裂变，可以说，本书的研究并非是孤立、表面地研究，而是将研究对象置身于历史背景之中，实现多维度观察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变化。作者在书中展示了“论言责之难尽”（SB 21. 11. 1884）、“论时势之岌岌”（SB 3. 9. 1884）等五篇申报文章，一篇孙鼎臣的文章“论治三”和两篇来自新闻报的论说“愤录范睢传”和“论康有为”的原文和翻译，并对大量中国报刊上刊登的论说进行部分翻译，在这些翻译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佐证自己的观点。

海德堡大学学者费南山《中国新闻学开端》在一文中所言：“要研究‘新闻领域’中多种关系，仅观察报纸文本是远远不够的。”<sup>47</sup>

她认为，“对重构报馆操作模式非常有帮助的是个人札记、信件或是记者及同时代人的回忆录”<sup>48</sup>，例如王韬的日记和信件集，中国第一个（官方）驻欧洲大使的旅行日记，或是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的私人信件等等，这些都作为她著作的参考材料。

同时她也提出，要谨慎处理个人对报刊活动的不同叙述，因为不同的作者有着不同的立场和意图。也就是说，她辩证地认识到了，以旁白形式存在着的个人记录包含着对时代的丰富说明，包含着有关报纸物质产品及编辑组成人员的重要信息，但同时也意味他们对于报馆意义和作用的介绍无法非常“客观”。<sup>49</sup>

47 Vinttinghoff, Natascha, Die Anfänge des Journalismus in China (1860-1911), p.10.

48 Vinttinghoff, Natascha, Die Anfänge des Journalismus in China (1860-1911), p.13.

49 Vinttinghoff, Natascha, Die Anfänge des Journalismus in China (1860-1911), p.18.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作者为了研究相关话题阅读了大量一手资料，进行大量研究，并且辩证的去伪存真，从而使自己的研究真实可信。

## 二、问题意识主导新闻史研究

新闻史不应该只是以“流水账”的形式存在，倘若只停留在历史轴线上的叙述之中，新闻史的研究就只会是材料和数据的堆积，因此研究者需要对材料的内在逻辑进行详细的分析，揭示其隐含意义的内涵。

要在新闻史料中梳理出其内在逻辑，需要大量阅读原始文献，从研究对象出发，借助其他理论，从社会学、传播学等视角实现多维度的观测，带着问题去研读史料。正如燕安黛《只是空言》引言中所言，她以 1884 至 1885 年中法战争中《申报》的建言献策和 1898 戊戌变法前后的《申报》改良话语为分析样本，在资料阅读后提出以下问题：《申报》是如何构想并建立其作为国家政治事务探讨平台的角色的？随后以问题为导向，剖析了《申报》赋予其“监督”功能的过程等等。

再例如海德堡学系另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中国新闻学开端（1860-1911）》，此书目的在于介绍 19 世纪中国社会变迁时期现代中国新闻主义的形成，前言部分作者也强调指出她研究所着眼的问题是依层次推进的。<sup>50</sup>费南山基于文本研究的是新闻领域的首波活动，其中包括新闻从业者的相关特征及其社会背景、报刊生产的技术条件、新闻文本的形式，新闻工作的专业程度与晚清社会的政治讨论等等。一方面，她试图探究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和经济问题——也就是报纸是如何制作的；另一方面关注了报纸象征性价值的生产过程——也就是报纸是如何提供价值的，同时探究报纸在晚清的政治讨论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另外，梅嘉乐的《一份中国的报纸？：上海新闻媒体的力量、认同和变化（1872-1912）》关注的是作为一份“外来报纸”，《申报》如何让中国读者接受它的风格的？《申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本土化后，如何参与其中国身份的建构之中？在她研究着眼的四十年间，相关情况是如何变化的？<sup>51</sup>

正是因为以问题意识主导了新闻史的研究，并灵活进行横向对比分析研究，所以海德堡学系才能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实现多维度观测，提出许多独树一帜的观点。

50 见《中国新闻学开端（1860-1911）》引言部分。

51 Mittler, Barbara (2004), A newspaper for China? Power, Identity, and Change in Shanghai's News Media, 1872-191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三、不局限于通论

上述评析中提到,因为难以接受到原始文本,目前为止,对于首批日报历史的研究很少用报纸读物本身来证明,而更多的是通行的二次文献来支持研究。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些二次文献中,关于报馆的时间轴以及人员的数据总是会找到不同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往往意味着在叙事性说明和数据的补充中长期地存在着一些通行看法,比如学者偏爱把报刊史写成“通史”,上文提到的表述方式正是来源于此。费南山认为,其中最具有权威性,也是最多引用来源的主要是1928年戈公振(1890-1952)的《中国报学史》,而方汉奇(1926-),现如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领军人物,在新闻史研究方面其视野和地位也被看作是戈公振的接班人,他进一步推进了这种“通史”的研究,他的研究比起戈公振来说明显更为细致。

从西方文学家的角度来说,戈公振可以说是十九世纪中国报业建立的权威模范。Roswell Britton(白瑞华)的《中国近代报刊史,1900-1912》是以西方语言研究中国报纸最常见的一本著作,他在序言部分也提到,戈公振的研究对本书形成强有力的支撑。<sup>52</sup>海德堡汉学系主任瓦格纳则提到,对《申报》早期发展史的研究存在着一些定论,其中一点在于,此前的研究者普遍认为晚清时期官场上下之人对外商创办的《申报》怀有敌意,因此读者对其刊载的内容没什么兴趣,这种状况是到梁启超之后才有所改善的<sup>53</sup>。他还提出,戈公振所著的《中国报学史》为支持这种论调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素材,而戈公振书籍所采用的材料大多来源于《最近五十年——〈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册》及《上海闲话》这部轶事汇编。因此,在他看来,戈公振是以其中一个缺乏真实性的故事编成了一种带有学术意味的观点,也就是后来多为学者反复引证的观点——早期的记者不过是由一帮名卑位低的落榜举子组成的乌合之众。<sup>54</sup>但通过燕安黛、费南山的研究,驳斥了这种观点的可能性,她们的研究实现了对晚清时期记者地位、《申报》局面的重构。

尽管瓦格纳这一观点仍有争议,但总而言之,如果新闻史仅仅依靠二次文献来支撑研究,会使得新闻史的研究之中存在一些通行看法,而正因为海德堡学系多采用一手资料,所以提出了一些新颖观点。例如,在中国,现代报刊的引进通常被看作是西方文化商品以及信息技术的进口和接受,这些通行研究关注到的是,面对媒介技术带来的挑战中国是如何反应的,又是如何在模仿中赢得了“新的现代”身份,这样的观

52 白瑞华在其专著《中国近代报刊史,1900-1912》一书引言部分有如上阐述。

53 瓦格纳在其论文《危机中的〈申报〉:国际背景下的郭嵩焘与〈申报〉之争》中有如上表述。

54 瓦格纳在其论文《危机中的〈申报〉:国际背景下的郭嵩焘与〈申报〉之争》中有如上表述。

测方式基本上是在“刺激—反应”模式下进行的理解，忽略了受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行为；此外，还忽视了通过社会积极分子在土著文化之间产生连接点的多种可能性。

55

但在海德堡学系的研究中，他们提出了中国方面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积极参与进该进程的观点。

再譬如，燕安黛提出了一些独树一帜的观点。学界普遍认同，《申报》为了达到盈利目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满足各方面读者的需要，从而扩大发行量，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改革言论。“以往商业报纸重商业行情，忽视言论，视之为可有可无，从香港的《中外新报》到上海的《上海新报》都是如此。而《申报》认识到言论的重要性，认为言论‘有系乎国计民生’，‘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穡之苦’（《本馆条例》，1872年4月30日《申报》）。所以，《申报》不但每期必有言论，而且置于首页，引人注目……《申报》的言论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重视与社会实际生活的联系。”<sup>56</sup>燕安黛也证明了《申报》是晚清时期“论说”最初的确立者，但她还继续往前探究，提出英美宗教报刊和商业报刊的模范作用，颇具创新性。

国内外学者都注意到“论说”这一政治参与形式在晚清社会的重要作用，燕安黛也以“论说”为切入口，探究报刊如何在晚清中国社会填补言路的空白，讨论中国早期的公共领域问题。她的创新点不仅在于梳理论说的建立和发展历程，还在于通过对报刊文章结构、修辞等方面的详细分析提出，随着政局的加速演变，经世文体与新闻大众媒体（报纸）发生了密切关系，出现了跨越文类的现象，指出报纸论说文章与经世文的趋同性，并进一步总结出晚清中国报刊“论说”的模型，为我国新闻史研究提供了详细参考。

此外，燕安黛在书中提到，“鲍吾刚（Wolfgang Mohr）在关于中国日报的研究中写道，（改良后的新）《申报》‘在1905年2月7日首次刊发社论’”<sup>57</sup>，但她通过对“社论”一词内涵的研究以及同时期其他报刊的梳理发现，最初引入社论概念的是《时报》，《申报》实际上刊登真正意义上的“社论”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鲍吾刚是德国著名汉学家，出版过16部专著并发表论文69篇，被认为“为学生打开了认识中国

55 Vinttinghoff, Natascha, *Die Anfänge des Journalismus in China (1860-1911)*, p.8.

56 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3页。

57 Janku, Andrea, *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p.248.



历史与哲学、道教与佛教、文化与文学的大门。”<sup>58</sup>但燕安黛并未因为鲍吾刚先生的学术地位而受权威观点的桎梏，而是通过严谨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观点和合理质疑，为进一步推动德国汉学发展做出贡献。

## 第二节 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系列研究不足及反思

笔者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尽管该系列成果在海外中国新闻史研究中颇具有影响力，但仍具有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作为西方学者观测中国新闻史发展时，难以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影响，另一方面在于全面性仍有不足。

### 一、意识形态的影响

海德堡学系学者尽管一再强调客观、中立，但仍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

意识形态的英文为 Ideology，据雷蒙·威廉斯考证，该词来源于法文词 idéologie。<sup>59</sup>最初出现在理性主义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的论著《意识形态的要素》之中，试图为一切观念的产生提供一个真正科学的哲学基础的“观念科学”。<sup>60</sup>提出这一概念时，特拉西试图从观念学的角度去阐释它，随后这一概念发展得更为复杂和多元化。经由拿破仑一世的发展，Ideology 以此带有贬义，多用于训斥极端革命分子的政治论断。

19 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批判了德意志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能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sup>61</sup>Ideology 在他们看来，首先是统治阶级生产的虚假意识，其次是指特定阶层或群体的思想信仰体系。在这里，意识形态指个人或团体心理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和表述体系。这一思想对后续“意识形态”一词概念的运用和延续有着极大影响。

对西方 20 世纪后半叶左派文化批评影响最为深远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家之一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sup>62</sup>，这一

58 摘自 1997 年 1 月 16 日德国《世界报》悼念鲍吾刚先生的一篇文章。

59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第 217 页。

60 俞吾金：《意识形态·哲学之谜的解答》，《求是学刊》，1993 年第 1 期。

61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

62 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253 页。

理解倾向于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先于个体存在的文化客体、社会结构、思想通道、政治无意识或混杂着个体想象的表象体系。[...]可能是一种动力体系，物质地、真实地发挥着改造我们的功能。”<sup>63</sup>

不可避免的，海德堡学系的研究视野、表述体系多多少少包含着共同社会团体的一致世界观。例如，他们多借用一些西方理论来观测中国新闻史研究，其中最主要的是流行于国外学术界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这一理论的历史背景是18世纪的欧洲，但国际学术界尤其是欧美学术界热衷于将这一理论用于其他非欧洲区域的历史阐释，从而演变为一个拥有广泛解释力的理想类型。

“对于公共领域理论的跨文化应用问题，哈贝马斯本人是很谨慎的。[...]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的理想类型，公共领域的理论可以‘跨文化’，无法‘超文化’，当我们对它进行规范论证的时候，可以将具体的经验事实暂时用括号括起来，然而一旦具体应用于某个地域，比如中国的时候，概念的有效性必须得到经验事实的支持，并且通过跨文化的历史比较，看看同一个公共领域的事实，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是如何呈现出不同的特殊性面貌的。”<sup>64</sup>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一种介于公权力与社会之间的真空地带，陌生公民走到一块，寻求一种理智的沟通模式，一方面要免于政治权利的压迫，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市场的异化，由此可看出这是一种近乎乌托邦式的理想论述。李金铨教授认为，海德堡汉学系学者试图论证晚清上海《申报》及其下属的《点石斋画报》及其他各种报刊，都在创造公共领域，“他们认为，上海的公共领域超越国界，异质性强，高阶与低阶杂糅成种种论述。”<sup>65</sup>

海德堡学系在借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进行晚清中国新闻史研究时，没有辩证地认识到这一理论的局限性与不足。

## 二、全面性不足

尽管上述优势分析时提到，海德堡学系多接触丰富的一手材料，但从客观及主观方面来说，其全面性仍有不足。

### （一）部分研究缺乏整体认识

以《只是空言》为例，燕安黛大量阅读、总结了同时期的其他报纸，但从另一方

63 高建平，丁国旗主编：《西方文论经典（第6卷）后现代与文化研究》，第205页。

64 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史林》2003年第2期。

65 李金铨：《新闻研究史：“问题”与“理论”》，《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4期。

面来说,《只是空言》所观测的个案多为 1898 年及 1898 年之前的报纸或报刊文章,对改良失败后报纸的观察较少,正如梅嘉乐所说,“这本书是最强的部分是在于谈论 1900 年以前的中国和《申报》。第八章对世纪之交时期对新闻法要求的出现的论述则有一些虎头蛇尾。”<sup>66</sup>此外,从 334 至 343 之间,燕安黛刊印了一些晚清时期中国报刊上的讽刺漫画,但她只在小字部分对漫画进行了简要说明,并未将漫画内容融入她的分析和讨论之中。总体来说,《只是空言》一书个案观测十分丰富,但整体的认识仍有欠缺。

### (二) 部分研究缺乏个案研究

再如梅嘉乐将所有报刊刊载内容都包含在研究之中,包括社论、新闻、插图、广告等等。“她将报纸整体把握为一种新式文本:包容众多文类、充满各种声音。在她分析报刊中的女性形象、上海人生活时,对社论、新闻、广告、插图、诗词等皆加以考察,还原出诸色杂陈的丰富图景。不过这种做法也有其局限,作者本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提出要想更好理解早期中文报刊的力量问题,还需对文本之外的其它方面做进一步研究。”<sup>67</sup>

简言之,梅嘉乐过于关注整体的认识,而忽略了个体的深层次研究。

### (三) 缺乏对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的全面把握

另外,研究的不足之处还在于海德堡汉学系研究者是以一个西方学者的立场和视角来分析的,所以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的现实并不能做到完整和准备的把握,因此这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分析可能存在偏颇之处。

例如燕安黛在阐述并分析康有为等人创建新式报刊时,着重强调的是西方报刊的启发性作用,及《申报》等报刊“论说”文体的延续性,而忽略了晚清时期新民的主观能动性。从中观之,将西方著作作为我们吸收西方学者中国新闻史研究经验时,仍需要客观分析,并用批判性眼光进行审视。

66 书评为 Mittler, Barbara (2007), Between Discourse and Social Reality: The Early Chinese Press in Recent Publications, 原文为: The book is strongest in the chapters that talk about China before 1900 and the Shenbao. Chapter 8, which deals with the emergence of press laws around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is a bit of an anticlimax. 来源于 <http://u.osu.edu/mclc/book-reviews/chinese-press/>

67 郭婷婷,郭丽华,刘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早期中文报刊研究概况》,《新闻大学》2007 年第 3 期。

## 结语

综合燕安黛的著作《只是空言：晚清中国的政治话语和上海报刊》，论文《为革命话语提供基础：从经世文编到定期刊物（在十九世纪的中国）》以及《现代都市的文人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试论〈申报〉主编上海黄协埙》可以得出结论，她提出以下观点：

《申报》在晚清时期通过参与政治讨论建立起了它作为国家政治事务交流平台，从而介入晚清中国政治公共领域，首先它做到信息达民，从而形成对既定机构的替代；其次，引发讨论，扮演“新国民”角色实现对国家政治事务进程的监督。

燕安黛认为晚清中国社会政治讨论领域结构性转型，主要是通过报刊将“论说”打造成公共政治话语这一方式，从而使得《申报》等报刊能够填补当时“言路”失效的空白，改变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话语传播模式。

她还重构了晚清文人记者的形象，认为他们并非常规想象中落魄不得志的形象，而是具有文人担当地自觉选择这一职业，并在传统的垄断性交流体系中寻找空间，在新的媒介技术发展进程中展现自我。

这一思想与费南山的研究也有相同之处，费南山在其著作《中国新闻学开端（1860-1911）》中提出，早期中文新闻报刊的研究存在着一些通行看法需要修正，其中之一就是认为早期报人地位低下，素质不高；第二，以出版社经营人员国籍将报刊定位为“外国”与“中国”，也意味着“不爱国”与“爱国”，“保守”与“进步”的简单二分；第三，梁启超办报之前，报刊内容单调，多刊登奇闻异事吸引眼球，缺乏真正的政治影响力。

瓦格纳曾强调，“学术界对中国地方性新闻出版业兴起过程的研究仍固守着一种‘中国中心观’的视角[...]考虑到19世纪后半叶英国外交政策的覆盖面已经囊括全球各地这样一种大背景，以及与之相伴的亚洲区域内不同地区和国家快速地现代化进程（包括出版业市场的现代化），上述研究范式显然不能清晰地揭示出前述中国地方性新闻出版业成长过程的独特性。”<sup>68</sup>

小组的系列研究以国际视角审视中国晚清新闻发展史，大量阅读中文原文文献，

68 鲁道夫·瓦格纳：《危机中的〈申报〉：国际背景下的郭嵩焘与〈申报〉之争》，《清史译丛（第九辑）》。

并认识到报纸文章语境的重要性，多采用同时期其他报纸作为对应的参考，或是用反对文章作为相互呼应，实现多方位一手材料的搜集和理解。

其次，海德堡汉学系学者对材料的内在逻辑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从研究对象出发，借助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从社会学、传播学等视角进行观测，以问题意识主导史料研读，揭示了材料与数据隐含意义的内涵。

第三，由于阅读大量一手文献，带着问题进行史料研读，并借助其他理论从社会学等多种维度进行观测，被认为“不拘于长期通行的结论[···]彼此激发、相互增进，得到许多新发现。他们不孤立、表面地研究对象，注重呈现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揭示对象涉及的多个方面，将对象置入各种背景加以审视；因此开拓了广阔的研究空间，描绘出丰富生动的图景。”<sup>69</sup>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尽管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尽量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但是仍然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影响。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深受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影响，在李金铨看来，“海德堡学者试图证明，在晚清上海《申报》及其下属的《点石斋画报》，外加林林总总的报刊，都在创造公共领域。他们认为，上海的公共领域超越国界，异质性强，高阶与低阶杂糅成种种论述。在哈贝马斯那里，西欧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展是与国家逐渐剥离或对峙的，而海德堡学者却反其道而行，一味想证明中国公共领域的轨迹与西欧经验分道扬镳。[···]他们的‘公共领域’界定得过于宽泛[···]”。<sup>70</sup>

其中原因在于，作为西方学者来观测中文报刊的社会化进程，尽管能够从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研究，但在置身历史语境进行理解这一方面仍有所不足，历史文本必须结合历史语境，将史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及相关政策、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系，才能还原整体图景，更深层次地还原历史脉络与发展趋势。

但总的来说，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一系列研究角度新颖，提出的一些观点有力挑战了以往史著中关于早期中文报刊的不少通行看法，大大加深了人们对当时报刊与社会的认识，颇具启发意义。过去针对中国早期新闻学的历史研究否认或是忽略了19世纪中国新闻学的重大意义，但在海德堡汉学系学者的研究中，整合了在过去中国报刊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偏见，并探寻诸如此类历史学描述存在的时间和动机。

诚然，本文的研究还停留在浅显的阶段，由于时间和人力有限，仅仅主要翻译了

69 周婷婷，郭丽华，刘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早期中文报刊研究概况》，《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70 李金铨：《新闻史研究问题与理论》，《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4期。

燕安黛《只是空言》一书，其他材料均为辅助，从全面性来看仍有不足；另一方面，由于跨文化的语言、情景等限制，对德文、英文专著的理解可能存在片面的情况。

但是本文希望通过译介这一系列研究，有助于开辟一个新的切入点，为我们观测自身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新的维度。

## 参考文献

- [1] 程曼丽：《横向比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思路》，《新闻大学》1997 年 01 期。
- [2] 丁淦林：《20 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6 期。
- [3] 方汉奇：《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新华出版社，1992 年。
- [4]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
- [5] 方汉奇：《1949 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新闻与写作，2007 年第 1 期。
- [6]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插图整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 [7] 谷长岭：《晚清报刊的两个基本特征》，《国际新闻界》，2010 年。
- [8] 黄瑚：《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新闻大学》，2007 年第一期。
- [9] 黄旦：《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新闻大学》2007 年。
- [10] 翦伯赞：《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史料与史学》，北京出版社，2004 年。
- [11] 刘增合：《媒介形态与晚清公共领域研究的拓展》，《近代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
- [12] 李金铨：《新闻史研究问题与理论》，《国际新闻界》，2009 年 4 月。
- [13] 李金铨，刘兢：《海外中国传媒研究的知识地图》《开放时代》，2012 年第 3 期。
- [14] 李彬：《“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新闻大学》2007 年。
- [15] 刘兰珍：《罗文达的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研究》，《新闻与传播评论》，2012 年。
- [16] 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王海、何洪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
- [17] 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年。
- [18] 谭渊：《百年汉学与中国形象——纪念德国专业汉学建立一百年（1909—2009）》，《德国研究》，2009 年第 4 期。
- [19] 谭泽明：《试论中国新闻史的特殊性——兼谈创新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新闻知识》，2012 年第 2 期。
- [20] 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

- [21] 吴文虎：《本体迷失和边缘越位——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误区》，《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 [22] 魏定熙：《民国时期中文报纸的英文学术研究——对一个新兴领域的初步观察》，《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4期。
- [23] 王敏：《政府与媒体——晚清上海报纸的政治空间》，《史林》，2007年第1期。
- [24] 徐培汀：《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史学史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 [25] 徐培汀：《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史学史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 [26] 熊月之：《略论晚清上海新型文化人的产生与汇聚》，《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 [27] 许鑫：《晚清民国时期传媒公共性的生成与演变(1815-1949)》，《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5期。
- [28] 阳海洪：《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特点》，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年。
- [29] 周婷婷：《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早期中文报刊研究概况》，《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 [30] 周伟明：《中国新闻传播学图书精介》，复旦大学出版，2008年。
- [31] 展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 [32] 张昆：《横向发展——新闻史研究的新维度》，《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04期。
- [33] 赵敏恒：《外人在华新闻事业》，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 [34] （德）鲁道夫·瓦格纳，克里斯托弗·A.里德：《谷腾堡在中国——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中国学术》，2005年第2期。
- [35] （德）鲁道夫·瓦格纳：《危机中的〈申报〉：国际背景下的郭嵩焘与〈申报〉之争》，《清史译丛（第9辑）（罗威廉专辑）》，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
- [36] （德）罗文达：《关于中国报学之西文文字索引》，《社会经济季刊》1937年第9期。
- [37] （德）鲁道夫·瓦格纳：《进入全球想象图景：〈点石斋画报〉》，《中国学术》，



2001 第 4 期。

- [38] (德)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 [39] (德)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 年。
- [40] (德) 杨誉(Janku 音译):《现代都市的文人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试论〈申报〉主编上海黄协坝》,载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年。
- [41]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汪晖译),《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
- [42] (美) 安德森(Anderson, B.):《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4 期。
- [43] (美) David Freedman:《统计学》(魏宗舒等译),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年。
- [44] (美) 柯马丁:《德国汉学家在 1933-1945 年的迁移——重提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世界汉学》,2005 年第 1 期。
- [45] Andrea, Janku, *Nur leere Reden: Politischer Diskurs und die Shanghaier Presse im China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3.
- [46] Andrea, Janku, *Preparing The Ground For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From The Statecraft Anthologies To The Periodical Pres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oung Pao, 90 (1-3).
- [47] Mittler, Barbara (2004), *A newspaper for China? Power, Identity, and Change in Shanghai's News Media, 1872-191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48] Rudolf, Lowenthal, *Ph. D. The Religious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 Peking: The Synodal Commission in China, 1940.
- [49] Vittinghoff, Natascha, *Unity vs. Uniformity: Liang Qichao and the Invention of a "New Journalism" for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2002.
- [50] Vittinghoff, Natascha, *Readers, Publishers and Officials in the Contest for a Public Voice and the Rise of a Modern Press in Late Qing China (1860-1880)*, T'oung Pao, 2001 87 (4-5).
- [51] Vittinghoff, Natascha, *Die Anfänge des Journalismus in China*

(1860-1911), Harrassowitz Verlag, 2002.

[52] Mittler, Barbara, *Between Discourse and Social Reality: The Early Chinese Press in Recent Publications*, <http://u.osu.edu/mclc/book-reviews/chinese-press/>

[53] <http://www.historychina.net/wszl/xxlh/2007-05-11/30180.shtml>

## 致谢

几天前的元旦，一觉醒来后恍然注意到，又是一年逝去。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如今是真切地感受到了。一转眼要跟自己的学生生涯说再见，甚是不舍，于是开始细数这几年的学习和生活，在这过程中越发感觉，我要感谢的人有很多。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刘兰珍。记得看到过这一段话：我认识一位喇嘛，几年前一起吃饭，一些人说起各种神迹，他笑着听，不评论。我问他怎么看。他说“我不能说这些东西肯定不存在，我只是说我从没见过。”他夹了一口菜说，“只不过真正的僧人只是像妈妈一样，讲最普通的人生道理。”

看到这段话时，我总会想起她，亦师亦友，不仅从学业上给予我帮助，更从生活的方方面面用积极向上的态度影响我，她对我来说，正是一位像妈妈一样的人。从德语到新闻学，跨考后进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习，很多东西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是空白的，本科除了毕业论文以外，我再没写过别的论文，更别说搞什么研究了。这篇论文我在开题后甚至自我怀疑过，迷茫过。因为它确实是个挑战，这一课题是很新鲜的，找到相关材料很难，找到外文材料后还需要自己翻译，而且不是翻译一篇两篇的问题，是一本书两本书。犹记得《只是空言》一书花了半年多时间翻译完后，我热泪盈眶，也在此过程中今天能呈现于此的论文慢慢有了框架。幸好这一过程中刘老师一直鼓励我、指导我，能师从这样一位亲切的老师何其幸运。

此外，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的其他老师对我的学习、生活也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感谢胡德才院长，您的治学态度永远值得我学习；感谢吴玉兰老师，您对待研究严肃认真，生活中又是那样一个美好温暖的人；感谢范龙老师，每堂课都是知识的海洋；感谢所有老师们治学严谨的态度，感谢您在课堂上提出的精彩观点对我有所启迪。

同样，还有我的同学们，我的室友们，我的同门师兄妹们，始终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于是我怀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写下这些文字，感谢能够来到这里，才能与大家相遇。

2017年1月6日于北京